

东方既白 ——写给湖南省博物馆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

李零

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、民不聊生的时代,但这一时期,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,其中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,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,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,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,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,可谓“东方既白”。

中国历史,源远流长,古人盛言三代。三代既是三个朝代,也是三个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块。夏、商、周三分天下,最后一统于西周。西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。后来,西周亡于犬戎之难,中国陷于分裂。历史学家把平王东迁到周室灭亡的历史称为东周史(前770—前249年),并把周室既灭到秦统一前的28年加上去,积549年,分为前后两段,前面一段是春秋史(前770—前476年),后面一段是战国史(前475—前221年)。

怎样以出土发现的物质资料来展现这段历史,又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思考这段历史,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。应湖南省博物馆邀请,我把我的感想讲一下。

诸侯力政,不统于王

首先,这段历史,特点是国家分裂。孔子不满其当代政治,首先是这一点。
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涉及这段历史,他有两个年表,一个是《十二诸侯年表》,一个是《六国

年表》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本之《春秋》,名为十二诸侯,列出的国家却是十四个,它是以周、鲁的纪年为经,而以齐、晋、秦、楚、宋、卫、陈、蔡、曹、郑、燕、吴十二国的纪年为纬。《六国年表》本之《秦纪》,名为六国,列出的国家却是八个,它是以周、秦的纪年为经,而以魏、韩、赵、楚、燕、齐六国的纪年为纬。这些国家,不仅有考古发现的遗迹、遗物为证,也有出土文字材料为证[当然,表中没有列入的国家还有很多,如从陕西东迁的虞、芮、虢,滹沱河流域的鲜虞—中山,淮水流域的南淮夷(如江、黄、徐、钟离),山东半岛的泗上诸侯(如薛、莒、邾、滕),以及僻处江汉的邓、曾、鄂]。当时,器物也好,铭文也好,各国各有各的特点,只有经过分国研究,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。

东周列国的兴衰,大体分三步走:

第一,周室东迁,晋、郑是依,晋、郑地位最高。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,秦亦因此而崛起。当时,郑、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,郑、虢争政,是乱之所起。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,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。

第二,齐、鲁、晋、卫、燕是

周初封建的五大诸侯,但春秋晚期,鲁、卫衰落,北方大国是晋、齐、燕,南方大国是楚、吴、越。南北对抗,主要是晋楚之争。孔子周游列国经过的曹、卫、宋、郑、陈、蔡都已沦为小国。

第三,战国时期,很多小国还在,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,但战国晚期,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,齐在东,楚在南,秦在西,燕在北,三晋(韩、赵、魏)居中。秦灭六国,先灭周,次灭三晋,后灭楚、燕、齐。

孔子做周公之梦,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,但再造中国统一的却是秦始皇。

礼坏乐崩,上下陵替

这是孔子批评的另一现象。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,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,而东周时期又主要以楚国的用鼎制度为例[参看俞伟超、高明《周代用鼎制度研究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78年1期,84—98页;1978年2期,84—97页;1979年1期,83—96页。该文把两周时

期的鼎分为镬鼎、升鼎和羞鼎]。所谓“僭越”,主要指东周时期诸侯卿大夫随葬铜鼎的鼎数超越了身份等级。

这个问题很复杂,恐怕应做进一步探讨(李零《楚鼎图说》,收入拙作《入山与出塞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4年,334—342页)。

首先,现已发现的楚鼎多出自墓葬,未必与礼书记载庙堂祭祀的用鼎制度完全相同。这些鼎至少可以区分为五种:

1.无盖大鼎,一般只出一件或两件,自名“镬”(这个字应如何隶定和释读,目前仍有争论),用以盛放“胾”,即半扇牛肉或猪肉,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,规格最高。

2.平底大鼎,一般为列鼎,往往撇耳束腰,饰垂鳞纹(这种鼎仍带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点。同一时期的秦鼎也有这种古风),有些还带盖,自名“登鼎”(登字或加皿旁)或“升”(带鼎旁),用以盛放“牲牢”,即牛、羊、豕、鸡、鱼、腊等成套的牲肉,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,规格次之。

3.矮足中鼎,一般为列鼎,深圆腹,矮蹄足,捉手盖,自名“繁”“孟”“石也”,主要流行于

春秋晚期,带有过渡性,规格又次之。

4.高足中鼎,一般为列鼎,可能从前者分化,特点是有细长的足,自名“鑄”,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,春秋晚期,多圆腹撇足,战国时期,腹变盒状,足变直立,规格又次之。

5.高足小鼎,一般为列鼎,特点是腹作圆盒状,三足直立,应即从前者分化,规格最低。通常所说的楚鼎主要是这一种。

上述五种鼎,第二种鼎确实是升鼎,但第一种鼎未必是镬鼎(以镬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。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),后面三种鼎恐怕也不是羞鼎。镬鼎是烹牲的鼎,升鼎是载牲的鼎(礼书也叫牢鼎),镬鼎烹牲,牢鼎载牲,一一相对,都是列鼎。羞鼎是盛庶羞的鼎,庶羞指肉、菜搭配调和五味的美食,即各种羹。这种鼎的出现可能要晚一些。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鼎,根据造册,就是盛羹的鼎。

我理解,当时的礼乐制度是从最高一级逐步递减。规格最高的墓葬,几乎全用铜器,器种最全,器形最大,纹饰最精美,但卿大夫和各级官员的随葬品,往往

(下转9版) ➔

◀ (上接7版)

后寥落,喜其子能自振拔,幸依宇下,尚望量才器使,俾得及时自效为荷。”

塔克什讷和联芳都是老资格的外交官。他们都是同文馆毕业,早在1868年,就跟随蒲安臣使团周游列国。这次访俄结束后,塔克什讷奉命将《中俄密约》文本装在一个加锁的匣子里,经德国先行回国。8月23日,他亲手把文本交给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和张荫桓手中。联芳后来官至外务部左侍郎、荆州将军。

那么,李鸿章为什么会同泽列诺伊多次合影呢?这个原因也很简单。李鸿章使团所乘的法国邮船“爱纳斯脱西蒙”通过了苏伊士运河之后,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轮船,过地中海进入黑海,至敖德萨上岸。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:“顷

抵倭德萨,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。”泽列诺伊是敖德萨的市长,后来也陪同参加了对李鸿章访俄的接待工作。

这里还要回答一个疑问。李鸿章使团前往欧洲时,沙俄政府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(也有译作吴王、吴克托、乌克托姆斯基等,他是沙俄刚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)专程在苏伊士运河口迎接,唯恐李鸿章被其他欧洲外交官拦截,先去别的国家访问,坏了他们与李鸿章谋划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东北的谋划。合影照片里的那个俄国人,会不会是乌赫托姆斯基?其实,早在2014年与家宁探讨沙士勃雷问题的时候,我们就通过维基百科核查到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形象,所以就放心地将他排除在外。

我还读到美国著名历史作家塔其曼在她的名著《远方之塔》中,对沙士勃雷,即索尔兹

伯里侯爵1895年形象栩栩如生的文字描绘。索尔兹伯里侯爵是英国老牌政治家,曾三度出任首相。他身高6英尺4英寸(约1.93米),年轻时又瘦又难看,佝偻且近视。头发颜色比一般英国人要黑得多。此时65岁,身材发福,肩膀变得宽阔许多,佝偻却显得更加厉害。他那沉重的光头加上满面卷曲的花白胡子,似乎给肩膀增加了不少负担。他衣着乏味,经常还很邋遢,裤子和背心都是沉闷的灰色,外面套的呢绒长礼服却油光闪亮。想想这样一位首相,怎么会张冠李戴,穿上海军少将的军服,膝盖上还放着一顶军帽,不禁莞尔。

当我将上述这些考证全部做完之后,最近读到新版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中吴宗濂的《随躬笔记》,获悉了本来不属李鸿章使团成员的吴宗濂为何出现在合影中的原因。原来,龚心钊在赴

俄途中闻悉父亲龚照瑗身体违和,匆匆离队,赶往伦敦探望,而后又返回使团。龚照瑗派驻英使馆随员吴宗濂陪送儿子前往莫斯科,使得吴宗濂观赏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盛况,也使他有机会参加到这场摄影活动中来。吴书中收入《俄君索印影像小引》,详细记录了这次合影的人物站位,与上述考证完全一致:

图中坐者,即使相与俄水师提督善勒诺(按即泽列诺伊)也,左右立者为伯行公子经方、仲彭公子经述也,其余挨次序立者则罗履臣观察丰禄、林和叔太守怡游、洪希甫二尹冀昌、木庵观察塔克什讷、薛凤嘴司马邦和、龚怀西太史心钊、俄文参赞柯乐德、驻华俄署武随员参将伏嘉克、乌苏里马队统领参将培尔诺甫、联春卿太守芳、张九斋二尹柳、俄外部参赞罗达臣、俄国马队都司马尔臣喀、柏宪章二尹斌、麦佐之二尹信

坚,森彼德堡府署随员男爵诺尔根、黄再番司马家惠,而为之殿者则宗濂也。

虽然吴宗濂早已记录了照片中全体人物的姓名和站位,但我们的考证过程依然充满乐趣,也非常有价值。互联网和手机微信使得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共同考证一个课题,使得天下的朋友相聚在一起,多好啊。

最后附带多说一句。根据吴宗濂记载,“俄皇加冕之日,傅相适抱微疴,辞不克往,惟驻俄大臣许竹笈(景澄)侍郎独入教堂观礼,余等自清晨入宫,俱在堂外层累而上之椅位列位而观。”呵呵,原来劳师兴众不远万里前往莫斯科祝贺的李中堂,签订完《中俄密约》之后,竟连加冕礼也没去捧场,如此洒脱,亦是奇葩。这次重要缺席,他压根没有向朝廷报告。